

卢鸿德 主编

日本侵略
东北教育史

国家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
“东北教育史研究丛书”

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

卢鸿德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

Riben Qinlue Dongbei Jiaoyushi

卢鸿德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0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½ 插页: 4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英健 王 松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封面设计: 李国盛

责任校对: 姚 正

ISBN 7-205-03462-0/G·620

定价: 32.00元

“东北教育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 卢鸿德

副主任委员 李喜平 郝庆堂 陶增骈
苏 甫

委 员	郭燕杰	姬庆生	朱恩田
	胡国有	李洪钧	张绍志
	李向山	郝廷德	赵文利
	郭 斧	阎崇民	张庆田
	刘献文	于 涛	路文彬
	侯广谦	刘远达	邓晓春
	纪芝信	沈 锋	郭正庸
	齐红深	赵长胜	郎人骏
	郎运坤	吕恒庸	刘兆伟
	魏正书	陈丕忠	颜震华

顾 问	王若夫	王纯山	马秋帆
	李 放		

主 编 卢鸿德

常务副主编 齐红深

副 主 编 陶增骈 苏 甫 赵长胜
郎人骏 刘远达 郎运坤
吕恒庸
编 辑 公亚男 张德兰 朴春燕
本 书 主 编 卢鸿德
本书副主编 齐红深 陈丕忠

代序——

关于伪满教育史的研究

卢鸿德

中日两国的学者欢聚一堂，共同召开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东北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加强中日教育和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会上，大家将重点围绕伪满教育史进行研讨。我正在主持《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借此机会，我想就研究伪满教育史的目的、方法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同各位学者讨论。

一、为什么要研究伪满教育史

从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取得旅大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之后，便开始了在中国东北的教育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直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这4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的历史，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重要一页，也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教育史工作者认真地加以研究。

马克思说过，人和动物不同，人在做一件事之前就有了明确的目的，并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设计。那么，人

们抱着什么目的和出发点来研究伪满教育史呢？我看，大概不外乎三种目的：

一种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教育侵略涂脂抹粉，或者为侵略者制定教育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历史借鉴。早在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已开始对中国东北和伪满教育史进行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山田丰的《满洲教育史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学务课编印的《满洲教育史略》、嶋田道弥著的《满洲教育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了一批御用学者，他们歪曲史实，掩盖真相，篡改历史，散布“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文化侵入满洲”，妄图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占东北制造理论依据。他们或者竭力宣扬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的所谓功绩；或者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权衡教育政策的得失良否，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修订、完善殖民教育政策献计献策。这样，便不可能通过对史实的全面分析来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是必须反对的。前几年，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制造“教科书事件”，妄图复活军国主义，遭到了中日人民的谴责。在伪满教育史的研究上，是不是也有人抱着这样的目的？

第二种是说自己研究伪满教育史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也不作结论，只对史实进行客观的描述。这种“为研究而研究”或“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在旧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曾经比较盛行，一些学者为了明哲保身，不落犯上作乱、借古讽今的罪名，故意把自己局限在烦琐考据的象牙塔里，故意把观点、见解隐瞒起来；一种是由于受到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缺乏洞察历史规律的能力。实际上，不加评论不等于没有观点，不带政治倾向性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不可能没有阶级立场。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著作，必然会带有作者的某种观点。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孔

子作《春秋》，是为了使“乱臣贼子者惧”。清代史学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他以周代的历史为例，说明“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的道理，强调治史要面对社会现实，要从史实的叙述中引出治乱兴衰的理论认识。这种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种是站在人民和进步的立场上，从维护和平、加强中日友好、总结历史教训、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出发来研究伪满教育史。我们知道，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奉行的殖民地方针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它推行的奴化教育不仅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以翔实的历史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教育侵略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造成的后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所有严肃的、负责任的中日教育史学者共同的历史责任。以海老原治善先生为代表的日本“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多次表示要对伪满教育进行检讨，要促进中日友好，反对军国主义复活。我们赞许这种态度。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鲁迅在赠日本友人的诗中写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主持《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的课题，就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教育史实的叙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性认识，从而达到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加强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目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站在人民和进步的立场上，就一定能把伪满教育史的研究搞好。

二、怎样研究伪满教育史

确立了正确的研究目的之后，还需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研究伪满教育史，除了一般的方法之外，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把伪满教育放在当时日本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加以研究。

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直接的联系。一定社会的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支配、制约并为之服务。教育的性质、目的、作用不仅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还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反映着教育主持者的阶级意愿和利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起来以后，为了解决国内的矛盾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对中国东北等地疯狂进行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抹杀东北人民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正是为了实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图谋；降低文化知识水平，在重视实业教育上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正是为了经济掠夺的需要。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东北的不同阶段，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教育的政策和重点。伪满建立之初，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在思想教育上大肆宣扬“民族协和”、“共存共荣”；随着殖民统治的加深，日伪统治者于1937年抛出“新学制”，是殖民教育走上成熟的标志；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伪满教育全面纳入战时体制。只有把伪满教育放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背景下加以深入考察，才能看清伪满教育的发展脉络和日本侵略者教育政策的反动本质。否则，仅仅停留在对教育规模、状况的一般资料性的表述上，便难以揭露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

（二）要把伪满教育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来加以研究。

伪满的教育方针、政策服从于并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在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是其进行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首先宣布禁止悬挂中国国旗，废止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和排日教材，将《孝经》列为课程内容。伪满洲国成立后，即宣布实行“王道主义”教育，推广“礼教”，“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浩浩，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接着，便具体规定教育方针为：“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为宗旨”。1937年公布“新学制”时，进一步规定：“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之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1940年，再一次宣布伪满教育宗旨是：“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唯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把伪满的教育方针同其整个侵略政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知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其理论基础是“王道”与“神道”。当然，像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一样，由于受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抵制，伪满奴化主义教育方针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所谓“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之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健康”也是为了

培养甘受殖民统治的“忠良国民”和能够为其创造社会财富的奴才。如果脱离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孤立地描述某些史实，片面地夸大传授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所谓功绩，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要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同时，文化又是教育的来源和依据，教育乃是文化的选择、传递与创造。伪满的教育同样不能违背教育与文化的客观规律。

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组成部分，与中原文化同种同宗。殷末箕子遁朝，向辽东传播礼义田桑。历代中原王朝为了安边实邦，巩固对边疆的统治，向东北地区宣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鲜卑、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蒙古、满等东北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民族发展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也积极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对于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从1905年起，把“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作为培植殖民地文化的实验场，妄图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创造所谓“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的殖民地文化。但是这种文化统和是以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为前提的，必然受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强烈抵制。这是其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屠杀、奴役中国人民，动辄扣上“思想犯”、“经济犯”的罪名。却幻想让被压迫的东北人民对侵略者、刽子手讲忠尽孝，讲礼让。日本帝国主义口头上宣扬的“民族协和”、“一德一心”、“东方道德”的高调与侵略暴行恰恰形成了绝妙的讽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总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为之所用，却不曾被外来文化所利用。日本帝国主

义一反“五·四”新文化的进步潮流，恢复祀孔读经，并把日本的神社搬到东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来阻碍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这种违背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必然不能得逞。从教育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伪满教育史，不仅会开拓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也更容易加深对教育规律的认识。

（四）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伪满教育史。

包括伪满教育与伪满之前和伪满之后东北教育的比较；包括伪满教育与台湾、朝鲜、东南亚等其他日本殖民地教育的比较；包括殖民地中国人教育与日本人教育的比较；包括伪满教育与日本国内教育的比较。通过比较，会加深对伪满教育的特点、本质、状况等的认识。比如，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为什么没有采取在台湾和朝鲜那样的强制性同化主义教育方针？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到底是提高了东北人民受教育的程度还是阻碍了东北近代化教育的发展？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对东北的日本人教育采取“乡土化”措施，等等。只有进行比较研究，才能透过现象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比较研究有许多方法，仅以采取量化的方法为例，我们便会看到，日本在东北用于教育的经费只占从东北掠夺走的大量财富中的很小一部分；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教育条件要比中国人的教育条件优越得多；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教育甚至好于日本国内；日本侵略者在“关东州”经营40年所达到的教育程度我们在解放后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超过了。

应当承认，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伪满教育史，尚处于拓荒的阶段。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们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过去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是很不够的。希望中日学者加强学术交流，繁荣东北及伪满教育史的研究。

（在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1993年8月）

绪论

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运用

李 放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5年日俄战争，在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主义列强凭仗坚船利炮，对中国鹰攫鲸吞，瓜分沃土，当时的日本依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清签订的《中日会议东北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占有了旅大地区的租界权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其权益，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的地位，亿万民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神州大地腥风血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尤为甚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国东北全境沦为殖民地，在屠刀下的东北人民成为被宰割的奴隶。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民心，培养驯服的奴仆，又在沦陷区积极实施奴化教育，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迄今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如何看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还其真面目，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这不仅是研究东北地方教育史之所需，而且是加强与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客观要求。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究竟是“王道乐土”的“和平教育”，还是殖民地的“统治教育”；是民族压迫的“奴化教育”，还是日满亲善的“智民教育”；是政治韬略的“愚民教育”，还是强国富民的“济世教育”，诸如此类的见解，在近半个世纪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呈现出一片“色彩斑斓”的理论世界，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澄清、去论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哪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运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采取掩耳盗铃的方法，还是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这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说，解决正确的方法论问题，乃是统一认识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前提。

一、研究方法论的阐释

我们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人所共知，世界万物都是客观存在，都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表现为发现和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却不能随意编造、改变它。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我们还认为只有在这条科学的认识路线指引下，才能正确选择和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现代方法，从而才能正确采用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使之有机地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方法论体系。其中，哲学方法要讨论科学的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而“三论”方法虽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大的运用范围，但它却不能像哲学方法那样抽象地对待世界，而是较为具体地、精确地、定量地对待世

界，是一种“胶合剂”，把哲学方法与具体的科学方法牢牢地粘在一起；它是一种“转换语言”，使哲学方法转化到各部门的科学方法之中，又使各部门的科学方法统帅于哲学方法之下。至于具体的科学方法，它在哲学方法和“三论”的指导下，可供采用的方法是繁多的，歧异的，而不是固定的、万能的。它们是以课题研究的需要为依据而被纳入科研方法体系之中，起着攻坚的“尖兵”作用。这些具体的科学方法，在科学分类上可分为旨在了解过去教育发展实况的历史研究法；旨在探讨现在教育活动真相的现状研究法；以及旨在预测未来教育发展状态的实验研究法。当前更新的科学分类则是把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分为五种类型，即历史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此外，还有其他分类，但就其科学性来说，远不如上述的分类。显然，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教育，首要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并要在其指导下，根据研究的需要，恰当地选择与运用“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追寻、探索 and 发现一个新领域，得出一个新结论，为科学殿堂增添一个新的颗粒。这就是所谓的“凿石取玉，剖蚌求珠”，决不该主观臆断、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现今，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采用科学的方法体系，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根据历史事实，做一番客观剖析，力求取得一个符合实际的共识。这是既有益于东北教育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中日邦交的学术活动，相信会受到坚持真理、造福人类的学者们的欢迎和支持。

二、研究方法论的运用

研究方法论源于研究实践，高于研究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对实践起着指导作

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便没有正确的实践活动,也就得不出新的科学认识。同样,研究方法理论与研究方法运用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方法论体系,其中的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根本的,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是区分两种方法论体系的“灵魂”与标志,而“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则是从属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化和实际运用。据此,我们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研究。

(一) 历史反思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客观存在、是铁证。事实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起点有错、结论必误”,这是科研实践反复验证过的真理。想要起点不错,对待事实必须做到客观、翔实、公正。首先,我们来看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实施状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悉遭破坏,各级学校被迫关闭。到1933年小学仅恢复9 100所,只占事变前的小学13 000余所的70%;学生数502 100余人,占事变前的学生数747 100人的68%;教师16 290人,占事变前的教师数24 400人的66%。到1937年,中学才恢复173所,占事变前194所的89%;学生33 600余人,占事变前学生数38 500人的87%;教师1 600余人,占事变前教师数2 400人的66%。1933年开课的高等学校只有2所,1935年只有5所,1937年也只有10所,占事变前30所的33%,实在少得可怜。可是,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地区教育破坏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措施:

1. 为了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控制,指派了大批日本人充当校长、副校长或学监、主持,以及教师,直接监视中国教师

的言行；

2. 废除排日教材，编审“国定教材”，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所谓的“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以及“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3. 将日语作为“国语”列为教材，并设置“语学津贴”，以资鼓励，意在“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

4. 为了使在职教师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去教育学生，先后开办了“教员讲习会”、“教员讲习所”，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以清除他们的“不纯思想”，提高他们奴化学生所需的素质；

5. 为了抵制爱国学生反满抗日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封闭了事变前的主要大学，剥夺了大部分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虽然日伪统治者为适应经济掠夺的需要和防止学生产生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也只开办了为数甚少、规模较小、专业残缺的农、工、医等类学校，极力限制文科学校的发展；

6. 为保证伪满的教育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政策发展下去，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务善导国民之思想，以养成忠良之国民”。实际是强迫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按照教育警察机关的旨意行事，如稍有不从，轻则免职、开除学籍，重则被杀头，甚至株连九族。

上述的若干奴化教育措施，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重点由建立和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向配合扩军备战的经济掠夺方面转变，于1937年春夏之交，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所谓“新学制”。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出了完整的奴化教育方针，其核心是实现所谓的“王道教育”；确立了系统的学校